

西方城市化理论反思与中国本土化 城市化理论模式建构论^{*}

张鸿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摘要: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多值得中国加以借鉴的方面,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本文的创新在于,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三大局限。并通过比较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误区的三个不成熟特点及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建构的困境与建构入径。本文认为,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实践模式,是引导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城市化;西方城市化理论;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1)09-0001-10

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是遵循怎样的城市化理论来发展的?提及上述问题时,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0%)的今天,难道没有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事实确实如此。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典型的、系统的,已经被实践所检验过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中国的学者一直在争论、探寻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发展模式——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西方城市化理论影响下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城市化在徘徊中发展,在对西方城市化某些理论的误读中建设,走了很多弯路。总结过去,我们必须有一个划时代的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建构:这既需要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认知模式进行反思,也需要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加以反思,进而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一、西方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局限

所有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都具有典型的时代

性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虽然很多理论可以在基本原理上寻找到合理内核和同一性,但是,对任何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和现实应用都应该与本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结论既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常识,也是任何理论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城市化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和城市发展道路的总结与反思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往往对西方的城市化理论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就不分良莠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相反,西方城市化理论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会自觉地提出反思与批判。如二战以来西方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中“乌托邦理论”的批判、“漠视社会性”理论的批判、“空间环境论”理论的批判,对“反城市化理论”的批判以及对“空虚”或者“空洞”的批判^①等。这种理论反思的经验与思维方式,对中国城市化理论的建构有直接借鉴作用。

1. 西方城市化理论模式的局限:“理想类型模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发展战略”(05JZD0038)阶段性成果之一。

式”与“极端认知”

西方城市化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无论西方古典城市化理论,还是近代城市化与工业发展关系的理论以及现当代的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理论,都是具体时代和具体国情的产物,其中生成的各种理论学派也必然存在着研究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时代局限。这种情况从古典时代就有发生。如被誉为西方古典时代城市建设经典的《建筑十书》,虽然展示了古罗马时代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和思想,但是作者著书的初衷是对“凯撒皇帝”皇权的“效忠”,其主要是设想“通过公共建筑的庄严超绝”来“显示伟大的权力”^②,城市建设规划成为“皇帝权力”的“婢女”和“附庸”。在近代社会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各国的城市化之所以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社会发展基础、发展进程以及人口结构、人口总量决定的。透过表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西方城市化理论在某些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与现实的脱节性和滞后性。如美、英、德和法等工业化早期曾出现的“过度工业化”、“城市工人阶级的贫困”、“社会环境过度污染”等普遍的都市社会问题以及工业化后期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等,城市化走过很多弯路。但是,相关的理论缺乏预测性和引导性,而仅仅具有某种“城市化历史的总结性”。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既不能照搬、套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化理论,也不能照搬和套用后工业社会以来的城市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多类型的、区域差异过大的城市化。而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已经为我们研究城市化并使其少走弯路提供了某种保证和社会前提。

通过分析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时代局限,我们还可以发现西方某些城市化理论非科学性和非学理性的倾向,这也许与城市化理论本身学科属性的模糊性有关,但是同样受制于某些学者个人研究视角的狭隘与价值观的局限。如欧洲早期城市研究学者滕尼斯认为:“大城市和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毁灭和死亡……。”“在大城市里,在首都里,尤其是在世界城市里,家庭制度陷入衰落瓦解。”大城市里“住所不管住多长时间,处处都是为了钱。”^③这类对大城市的偏见与极端观点在西

方城市化理论中可谓是屡见不鲜。人类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证明,从工业社会以来,虽然大城市的发展存在着问题,但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并以不断产生新功能的方式建构新的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在当代西方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仍然存在着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就业区的分离、城市中心区几度衰落和再兴及郊区化形成的城市蔓延等,此类问题在当代中国也正在不断重演,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中不断发生。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有封闭式的、隔离型的包以围墙的社区(住区),城市社会关系与结构的被“碎片化”,社会分层不断深化,优质资源持续被少数人占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尺度空间的大学城、工业区、新城区的过度圈地对土地资源造成惊人的浪费——这些现象均与过度依赖西方城市化理论有某种关联。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80%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表现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而中国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21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④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多地少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

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是一种‘破坏性’建设!”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⑤,要么是以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⑥,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如“田园城市理论”、“同心圆理论”以及“中心地论”等,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

就城市化的动力来说,中国与西方也有本质的差别。以往我们在理解中国城市化动力时,多数是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为主体认知,如“劳动力人口流动说”^⑦等。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主要是在这种人口“拉力——推力”的效应下兴起和加速发展的,在1801—1851年的半个世纪里,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和蓬勃发展时期,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6%上升为50%;美国从1800年的6.1%上升为1890年的35.1%^⑧。西方城市化动力理论还有“产业集聚效应说”、“农业产业剩余说”以及“工业化动力说”等,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说明了西方不同国家城市化“动力因”结构的不同序列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中国城市化已然走过了西方200年的路程。然而,一方面城市化高速发展;一方面传统乡村分散与落后的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均是低教育简单劳动群体,长期不能够从农业生产领域直接转移到现代工业领域,使城市社会问题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其主要结症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城

市化理论加以引导。

2. 西方城市化理论发展前提的局限:时代拘囿与“西方中心化”的负效应

西方城市化理论发生的社会前提也具有某种“本土性意义”。以美国为例,其城市化能够形成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原因有四:^⑨一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的充分竞争和剩余价值规律,促使生产力、资本、能源和人口向城市集中成为必然;三是由于美国当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包括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法国等都有殖民地),随着本国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源短缺,殖民地成为推销商品、资本输出和能源供应的强大后方;四是社会整体上形成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而这几种社会前提在中国不是不充分就是不具备。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价值取向主导下,西方城市化理论研究明显缺乏“内视力”,虽然学术自由批判时有发生,但是没有真正看到自身发展局限,也没有意识到其理论发展的超前性时代价值与特质,更没有从西方社会属性的视角总结西方城市化的历史理论与逻辑。相反,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在被“西方文化中心论”不自觉“侵入”的中国,都把西方城市化理论当作人类整体的城市化理论加以应用,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学者把西方城市化理论神圣化、唯一化、主流化,不分国情和历史阶段,言必谈西方,从教科书到研究成果,都把西方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时间,中国大地到处都“洋规划”和“洋人规划”的城市。总结、归纳西方城市化的独有性可以看到,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从古典时代起出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到中世纪市民阶层崛起创造的“城市文艺复兴”及市场契约关系的深化、国家福利的演进及后现代社会的生成等,“自然长入”

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型初期,西方中世纪庄园的手工业和纺织业等经济产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产业工人的劳动力;工业化后期出现的新兴工业化,以20世纪50年代白领阶层超过蓝领阶层为标志,人口结构转型与产业转型几乎同步。^⑩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在研究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过程中,对其社会属性、文化内核、历史前提及理论局限都未能进行合理的批判和筛选。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正因为过度依赖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使得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和本土化的乡村形态都处在正在消失的过程中。

中国城市化另一个特殊限制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即中国和西方人均土地资源占有模式和平均占有量的不同。一是中国土地性质的特殊性和集体土地的制度性因素。马克斯·韦伯曾说:“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它不是所谓的古希腊‘城邦’,没有中世纪那样的‘城市法’。”^⑪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国有土地的“非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性”,是中国“制度型城市化”社会结构问题发生

的核心原因之一。二是中国土地人均红线的危机性。2011年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⑫。与世界其他国家按农业人口人均耕地数量比较,中国为0.1公顷,印度0.3公顷,日本1.2公顷,英国5.9公顷,美国30.6公顷,阿根廷8.2公顷^⑬——仅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十二分之一,英国的六十分之一,美国的三百分之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2000多个县级区划中,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划定的0.8亩人均生存警戒线^⑭,而这些县大部分在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密集的省区。显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土地奇缺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不仅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模式,而且更不能走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同样的城市化道路!

有些学者一直在传承传统的区位理论,并以此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年)、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帕兰德的“设施区位论”(1935年)等——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时过境迁,有些解释已经不能够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与要求。如传统区位论者在论及区位的存在价值时,无不强调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与地租成本和原材料运输成本等,这些成本虽然都具有“事实成本价值”性,但这些理论认知都是在交通条件发展水平较低的“非信息化时代”产生的,现代社会在相对区域里出现的整体经济格局和现代大交通体系已经打破了传统区位论的价值观与区位观,特别是现代“物联时代”、“高铁时代”、“智慧城市”及“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生存空间、生产空间、物流空间、就业半径和社会区位意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等虚拟区位空间概念存在的条件下,比较而言,一定范围内的区位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整合在整体运作成本之中,有些甚至可以被忽略。在新的智慧科学时代和“新人文区位观”下,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已经不再是以人口集聚为前提,而是以新的通信方式、交通方式、沟通方式、工作方式构成后现代的、分散化的城市化生活方式模式。因此,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应该在诉求民族智慧、天人合一和回归

自然的意义上,走中国式的、以城市生活方式普及化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总结世界上现存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发展方针,一般可分为:(1)以大城市群发展为主的模式;(2)以大城市为区域核的发展模式;(3)以大城市和中小城两条线路平衡发展的模式;(4)以中小城市发展为主的模式;(5)以城乡二元结构分异为主的发展模式;(6)以城乡一体化为主的发展模式;(7)以城市整体现代化为主的发展模式;(8)以后现代城市社会深发展为主的模式。很显然,这些模式有的是以国家为单位成为一种模式的(如新加坡等城市国家),有的是以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发展模式;有的是集中的区域型结构,有的是非均衡的多元状态结构。在英、美、法、日等国^⑤虽然以大城市连绵区的发展为主流,但是中小城市也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即使是很多人认为的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德国,也是以大城市结构为主体,形成地域性的城市(群)化的结构模式。

3. 全球城市化理论的局限:虚无性与“地方性精神”的丧失

全球化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形成与城市的全球化分工。现实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国家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城市相互联系或结盟构成的以城市经济结构为纽带的地球。“所谓的全球化核心包括金融市场、国际贸易、跨国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劳工。通过这些全球化、策略性的经济组成要素,经济系统可以在全球层次相互连接。”^⑥全球化具有不可抗拒性,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描述全球化时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⑦全球网络的发展,正在“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⑧

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与其他的事物的发生、发展一样,也具有“二律背反”的属性。“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了向下的拉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⑨在全球化引导下,城市替代企业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城市与企业发展一样,惟恐跟不上全球化的浪潮,被排挤

到潮流的边缘沦为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每一座城市都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优势。“每一个城市的辖地都遭受新的紧张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存在经济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动减缓的和遭受排斥阶层充斥的城市……这些分界并不仅仅表现在空间上,甚至表现在国际竞争和城市活力方面。”^⑩全球城市化的一个显性化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了!从城市空间,到城市建筑;从城市景观,到城市色彩;从城市街区到城市社区的名称;从城市的肌理,到城市的文化表现,都似乎越来越西方化了。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与其对当地造成的不良后果始终是共存的。”^⑪但是,她的分析远远没有涉及全球城市化的本质——如果我们把全球的城市分工看成是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一种进步的话,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应该也必须是差异化的,这个差异不仅仅是产业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还必须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景观、功能及有机秩序的差异,这样的全球城市化才可以称为是一种社会进化和进步!一个假设是:如果全球城市化使全球的城市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以一种模式发展,这不仅是某个城市的悲剧,更是人类全球化的悲剧!

因而,有学者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没有严重模糊性和局限性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一个定义开始,‘行为活动的世界性扩散、洲际关系的扩张、社会生活全球范围的组织、以及共有的全球意识的增长’……一种新型城市,全球城市正在出现,并引起人们大量的思考和研究”。^⑫这一解释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全球化面前,世界必须形成新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模式!我们需要经常试问:“全球性的变化应该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同质性,还是越来越多的异质性,还是两者的混合?”“本地性与全球性是一个什么关系?”学理性探讨的价值在于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当花旗银行赤字消息披露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股市全球性下跌;当美国攻破伊拉克后,其直播电视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地方文化的混合性,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全球本地化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克里奥耳化,克里奥耳这个术语一般指的混种的人,但它已被延伸到‘语言的克

里奥耳化’这一概念……克里奥尔化与混合化经常可以相互交换使用。”因此，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全球本地化的概念）：“坐在伦敦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现在，它们在那里非常普遍了]，伴随美国的‘海滩男孩’乐队的演唱‘但愿她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姑娘’，喝着一位阿尔及利亚的侍者送上来的意大利浓咖啡”。^③透过这种全球化浪潮形成的文化混杂性看去，我们会发现，也正是全球化给“混杂文化”的成长创造了前提和土壤。当世界的一体性、即时性、同时空性、网络性给人们以现代生活的时候，这种文化的混杂性在说明全球进步的同时，也在说明城市地方精神文化的某种退化和丧失。

实际上，当人们面对全球城市西方化的文化大浪袭来时，似乎所有的城市又都在试图创造民族性、地方性以期与世界大潮相抗衡，如有些国家在举办世界全球化象征的奥运会时，开幕式都在强化国家与城市的特有文化，似乎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国家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形成两种并行的文化行为：在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又不自觉地竖起一座思想与文化的“大堤”，抗拒全球化浪潮的来袭，似乎每一个城市既需要这种世界性的全球化浪潮，又怕被这个浪潮所吞噬。这或许是人类社会进化矛盾的必然结果，地方性城市文化的丧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事情，是全球城市化整体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全球化的本质应该是在同一性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地方性精神的传承与再造。英国地理学家阿密和史瑞夫指出：“在过去，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不同地点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中的非公平性。……因此，全球化不是暗示地点之间的同一性，而是对不同疆土差异性的保留。”^④这种认识是强调一种精神，就是所谓的地点或者是“场所精神(Genius loci)”，“根据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⑤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城市地方性的价值表现了多样化的世界，越是民族优秀的空间与文化，“越具有人类认同感”^⑥，是“浓缩的小宇宙”^⑦。但是，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主流化的冲击下，其在中国几乎占居主导地位，更

为堪忧的是，中国很多城市“被西方化”得非常彻底，不仅把西方化的城市形态与空间作为时尚，更作为整体性实体空间来建筑，甚至在广袤农村的乡镇建设、村镇建设中也比比皆是（如湖北、江苏、江西等地乡村建筑的“欧陆风”）。除了在欧洲等一些少数国家能够看到整体性的、典型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完整城市空间体系外，全球后发达国家城市的地方性均被西方文化肢解得体无完肤。古老的首都北京本来应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和创新者，反而成为西方城市建设空间与景观的试验场。包括南京、杭州、开封、洛阳等千年古都，在全球化浪潮中也正在丧失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肌理、城市轮廓、城市建筑文化要素等都披上了西方文化的外衣。有学者批判说：在全球化的现代隐喻中“渊源于人类境遇的传统关怀大多被征服、控制和取代了：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body)、脱离自然(nature)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place)乡土联系。颓然被看成是一架机器，自然界被看作是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⑧深入分析会发现，世界一体化的大潮往往是在牺牲城市地方性、牺牲地方性原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推进的，如果这一地方性群体中缺乏文化精英的社会文化选择意识，某些地方性的人文和自然原生态文化就会被荡涤，进而失去地方性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力。当代中国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从古代名都到现代新兴城市，大体上都因循着相同的结构、相同的功能、相同的“样式”发展，似乎也在失去“身体”与自我，失去自然和地方性。

只有让全球的城市充满地方性，世界的城市百花园才能万紫千红。人类应该重视城市的地方性文化精神，否则，全球真的可能只像一个城市了。

二、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及重构

1. 城市化理论与发展模式的不成熟：从“消灭三大差别”到“均衡经济陷阱”

消灭城乡差别曾是经典理论家的重要思想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了“消灭三大差别”

的口号,其中包含了“消灭城乡差别”的理念。列宁曾经讲过:“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⑩从社会发展的进化角度讲,“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具有社会的进步性和理想性。但是,是“缩小三大差别”,还是“消灭三大差别”,这是理论科学性的一种认知方式。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努力只能是“缩小三大差别”,而不可能完全“消灭三大差别”,由于对这一认识的模糊性,以至于在当代的理论研究中,既很少有人提及“消灭三大差别”,更少有人论及“缩小三大差别”。^⑪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差别是一种普遍模式,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消灭差异”是一种典型的不可实现的理想类型。从西方已经走过的城市道路的经验可以看到,即使是已经完成城市化发展的国家,也仍然存在“三大差别”,只是存在差别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中国人口城市化无论是规模还是流动方式,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21世纪初,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有1400万左右,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扩大再生产能力、土地与住房需求和就业岗位数量等都造成巨大压力。1978年后的20年间,大约有1.8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数字超过许多大国1998年的总人口数,如巴西(16000万)、俄罗斯(14700万),创造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流动。^⑫而且这些外来城市人口长期是“候鸟型”的“城市边缘人”。^⑬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巨人面临城市化风险》的文章,表示:中国“2009年创纪录的2.11亿农民工,普遍无法在他们辛苦劳作的远方城市享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福利。”^⑭1987年到2001年间,全国有多达34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了失地农民。^⑮当前,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在5000万人左右^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预测2020年将达1亿人以上^⑰。这样的社会人口结构与土地结构关系,迫切需要中国创造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城市化理论,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2. 城市化核心价值与学科属性的不成熟:以城市规划理论替代城市化理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学者和还是城市政府官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把城市规划理论视同于城市化理论。如美国学者柯林·罗·弗瑞德在其所著的《拼贴城市》一书中说:“弗兰克·劳·赖特认为:‘在这方面,我看到建筑师成为现代美国社会文化的拯救者,一个针对目前所有文明的拯救者。’柯布西耶认为:‘有一天,当眼下如此病态的社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可以为它的病症开出准确的药方的时候,也就是伟大的机器开始启动的那一天。’”^⑱这一观点似乎把城市规划理论视作万能。无独有偶,在中国,用城市规划理论取代城市化理论十分普遍且更为彻底,在有些人看来,城市化是规划出来的,甚至直接由区域空间规划、产业集聚规划设计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尚没有真正分化出典型的城市科学系统理论和具有“独立辩护词”的城市化理论。

在“制度型投入”城市化的基础上,中国的城市变成了巨型企业。城市是国家GDP创造和考核的主体单位,这使得城市化在整体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产业集聚型的城市化,以追求城市创造的GDP产值为主要目标。为了使城市能够创造更高的GDP,政府通过权力调控城市化发展要素构成和序列,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可以看到:“合法权利用于制定政府计划,因此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于合法化的需求是从行政系统明显的功能性条件中产生的——这种行政系统在填补着市场功能的空缺。”^⑲所以出现了“城市空间规划型的城市化模式”和“产业规划型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发展在“五年一次的计划”中被一次次刷新,每一届城市政府都有新的、在“城市规划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化模式”。这一问题的核心是,用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替代中国城市化理论是有悖城市化发展规律的,我们需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不仅要创造性地表现本土化的城市物化空间,而且还要创造能够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21世纪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

3. 城市化区域行政管理理论的不成熟:城市地域关系的真空与结构空洞化

中国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系统未能形成跨区的空间整合模式,各行政区划间地域空间关系缺乏市场关系和制度性突破。在区域空间整合方面,既缺乏顶层的制度型创新与理论创新,也缺乏市场经济关系下的具体空间有效整合机制。中国已经形成多种形态的都市圈结构,在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的条件下,2000个县级单位中的1600多个“非设置市”的县域城市化,没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下一轮的城市化必将主要在县一级空间深化和展开,其中一万多个重点乡镇是县域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节点。如果由于县域城市化发展方向长期模糊不清,必然使中国的高速城市化遭遇新的瓶颈,如果未来的20-25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85%左右,将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分流走向城市,下一轮的中国城市化应该走何种道路?这一现实迫切需要中国建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并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社会来临意义上的城市化模式!目前问题是,在大区域都市圈内的城市之间、在省域城市行政区之间、在县与县域城镇之间、在县域内的乡镇区域之间,甚至在街道与村组之间,存在大量存的或大或小的“区域性结构空洞”,存在着多类型、显性化的“三不管地带”,成为不同类型落后区域和被遗忘的“社会角落”,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区域社会发展中的“中间型地带”——在大区域范围内形成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落后状态,而且这些地方多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滋生地。

城市群内部城市空间格局分离,必然造成就业、居住、生产、生活和消费空间的不合理区隔,更重要的是“区域性结构空洞”的存在,会使很多城市社会问题陷入更深的轮回和放大之中,特别是县域城市化被排挤在国家整体城市化体系之外,县域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定位,会进一步导致乡镇社会发展“负进化”的深化,使得中小城镇与大城市形成“结构性分离式模式”,这种城市化形成“社会偏心圆结构”的运行状态,城市化发展越快,传统乡村和乡镇发展越是落后,其结果是“经济回波效应”,成为新社会问题发生的土壤。从区域空间结构发展现代性上分析,中国的小城镇从未能够

与大中小城市区域形成地域结构关系,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形成两条分离的发展线路。2006年中国的建制镇有1.94万个,乡1.54万个。^⑧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乡镇城市化进程及社会问题呈类型化、区域化、分散化和封闭化的特点,费孝通早年提出“小城镇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依旧。^⑨

三、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模式——三大核心价值建构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⑩中国城市化缺乏本土化的核心理论必然导致并形成这样几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创造本土化“循环社会型城市化模式”。这是一种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的城市化模式,是以低耗能为入径,并最终创造循环社会型的“零耗能城市社会发展模式”。^⑪中国城市化已经形成了居高不下的高耗能城市化模式,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资源高消耗型城市化的化解之道。如中国仅“在水污染方面,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不到Ⅲ类标准”,90%的城市相关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⑫,几乎中国的城市都是缺水城市。从直接能源消耗意义上,201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日本的5倍”、“美国的3倍”。^⑬这种高消耗型城市化一旦形成历史性代价是很难偿还的。

第二,创造本土化的/充分就业型富民城市化模式。中国城市化的核心病症就是社会就业的不充分,城市出现的典型产业及与之相应的就业结构性空洞。^⑭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7%。^⑮而2010年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30多万,到“十二五”规划结束时甚至将达到700万人,^⑯大学生就业结构性/过剩问题十分突出。中国的农村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4.98亿农村劳动力中,有近3.5亿属于剩余劳动力。除了已经进入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213亿人外,还有1.5亿劳动力处于绝对失业状态,目前仍滞留在农

村。^b 就业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引发收入结构的不合理。2009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0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 ,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1倍, ,2008年是4.77倍。^o 中国一度曾把/下岗0当作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内容,事实上,没有充分就业,就没有社会发展和稳定,高失业的城市化必然会/高发0社会问题。

第三,创造本土化的/全员福祉型城市化模式0。中国的城市化缺乏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制度设置,社会保障缺失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在深层次上阻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2009年全国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13%。^p 2010年北京等城市曾发布有关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的有关通知,但在事实上多是执行乏力,有的形同虚设。以发达地区江苏为例,据52009年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报告6,在调查的3032名农民工中,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25.8%,^p 除了医疗,江苏省农民工的参保率没有超过50%的。中国的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可见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是任重道远。

当代中国城市化/超速发展0形成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和深化,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已经是当务之急。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的发展前提、影响因子、动力结构及资源禀赋的本质差异,只有依据中国实际才有可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其次,中国的城市化理论必须从传统城市规划学、地理学和区域经济科领域的视角中走出来,并上升到城市哲学理论价值的高度。/社会学家把城市形成的历史当作社会进化的一个形式来研究。0^p 城市化的社会进化本身表现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p /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0^p 城市在打破常规与传统的地域和血缘关系后,以货币关系为纽带形成社会压力体系,产生出传统乡村所不具备的功能))) /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

化死的東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0^p 城市成为人们理想与价值的实现地。^p 我们必须用一种学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探索人类的城市化规律,而不是/规划0和/设计0人类城市化的规律。其三,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和/现代性0创新的载体,^p 城市化与现代化一样,是社会压力释放与矛盾整合嬗变的过程。/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0^p 即某一社会阶段的现代化、城市化应该有一定的/现代性0结果,这样才能使现代化全过程呈现良性发展,并使社会进化实现整体的转型。本文强调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是设想引发、创新本土化的现代性))) 即以城市全员的幸福为现实行动和终极目标!

注:

- 尼格尔#泰勒:5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6,李白玉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92、24) 25、24) 25页。
- ^o 维鲁特威:5 建筑十书6,高履泰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 [»] 斐迪南#滕尼斯:5 共同体与社会6,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9、337、233页。
- ^¼ /拉美陷阱0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 ,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5 避免/拉美陷阱06,5 资料通讯62004年第4期。
- ^½ Carl Fingerhuth:5 向中国学习))) 城市之道6,张路峰、包志禹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 [¿] Kannada B.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84(1) 1984, 116- 130.
陆学艺等:5 社会学6,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 ^À 张鸿雁、高红:5 中美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发展基本规律比较))) 中美城市化比较的社会学视角6,5 江海学刊61998年第2期。
- ^Ã C. 赖特#米尔斯:5 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6,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 100页。
- [†] 马克思#韦伯:5 儒教与道教6,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
- [‡] 张路雄:5 中国耕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6,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8年。
- [‡] 亦非:5 18亿耕地红线面临严峻挑战6,5 中华工商时报62011

- 年2月25日。
- ‡ 李鸿谷:5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与未来6,5三联生活周刊6 2008年4月17日。
- ‡ 杜建人:5日本城市研究6,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 ‡ 曼纽尔·卡斯:5网络社会的崛起6,夏铸久、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 ‡ 莱斯特·瑟罗:5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6,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 ‡ 尼葛洛庞帝:5数字化生存6,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 214页。
- ‡ 安东尼·吉登斯:5失控的世界6,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 ‡ 伊夫·格拉夫梅耶尔:5城市社会学6,徐伟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 ‡ ‡ 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5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6,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12页。
- ‡ 乔治·里茨尔:5虚无的全球化6,王云桥、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9) 100、110页。
- ‡ 乔治·里茨尔:5虚无的全球化6,王云桥、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 ‡ ‡ ‡ 诺伯舒兹:5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6,施植明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65、78页。
- ‡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5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6,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5列宁全集6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 ‡ 钱学森曾说:1在人民中国建国100周年,将消灭三大差别0。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西安交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5钱学森沙论产业、草产业、林产业6,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1页。
- ‡ 张宏霖、宋顺锋:5城乡移民和城市化6,引自陈甬军、陈爱民主编5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称策研究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 ‡ 陈建东、廖常勇、邹高禄:5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问题的思考6,5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2009年第4期。
- ‡ 5亚洲巨人面临城市化风险6,美国5纽约时报62010年8月2日。
- ‡ 卢海元:5土地换保障: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政策选择6,5社会保险研究62003年第5期。
- ‡ 张怀雷、陈妮:5失地农民社保: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社会建设6,5中国劳动保障报62011年1月21日。
- ‡ 杨傲多:5民进中央:失地农民数量迅速扩大2020年将超1亿6,5中国青年报62009年3月14日。
- ‡ 柯林·罗·弗瑞德所:5拼贴城市6,童明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 ‡ 哈柏玛斯:5合法化危机6,刘北成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78页。
- ‡ 牛凤瑞等:5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 ‡ 费孝通:5小城镇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好6,5经济日报62004年1月4日。
-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7页。
- ‡ 张鸿雁:5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6,5社会科学62006年第6期。
- ‡ 牛文元主编:5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096,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 ‡ 张艳:5中国成第一能源消费大国 能耗强度是日本5倍6,5京华时报62011年2月26日。
- ‡ 傅剑锋、沈颖等:5就业篇:1毕业了 我们的工作在哪里06,5南方周末62006年4月6日。
- ‡ 李长安:5大学生失业率6,5上海证券报62010年1月25日。
- ‡ 李斌: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我国/十二五期间城镇就业缺口每年将达1300万6,5中国青年报62010年6月13日。
- ‡ 陈静:5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考)))由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造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引发的思考6,5现代农业62007年第1期。
- ‡ 常红、张海燕:5我国收入分配高度不均 10%家庭占有居民财产45%6,5人民日报62009年12月10日。
- ‡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年03月19日发布5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6。
- ‡ 江苏省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5你在他乡还好吗?)))江苏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上)6,5新华日报62009年12月11日。
- ‡ R. E. 帕克、E. N. 伯吉斯、R. D. 麦肯齐:5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6,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 ‡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5城市化6,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 ‡ ‡ 刘易斯·芒福德:5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6,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582页。
- ‡ 托马斯·柯斯纳:5资本之城6,万丹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
- ‡ 史蒂文·瓦格:5社会变迁6,王晓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 29页。
- ‡ 塞缪尔·P. 亨廷顿:5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0) 31页。

1 责任编辑:秦 川2

(下转第15页)

: Indicator, Data, Courage and Insight

Gu Hailing & Zhang Anju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studying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currently, and the difficulties ar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ajor points: lack of critical, suitable and public indicators of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The credi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ata are not high; The courage and insight are suppressed seriously of analyzing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naturally,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enduring research results, neither emerge economic masters.

Key words: data and indicator; credibility; courage and insight; Chinese economy

(上接第 10 页)

Reflection of Western Urbanization Theory and Theoretical Model Constructionism of Chinese Local Urbanization

Zhang Hongyan

Abstract: For China, there is muc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orthy of learn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Western urban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ese urbanization cannot use the Western's model and theory mechanically. The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putting forward three limits of Western urbaniz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Western urbaniz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ree imma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oretical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practical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dilemma of Chinese local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onstructing lo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ization will be the crucial premis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ou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Western urbanization theory; local urbanization theory; globalization